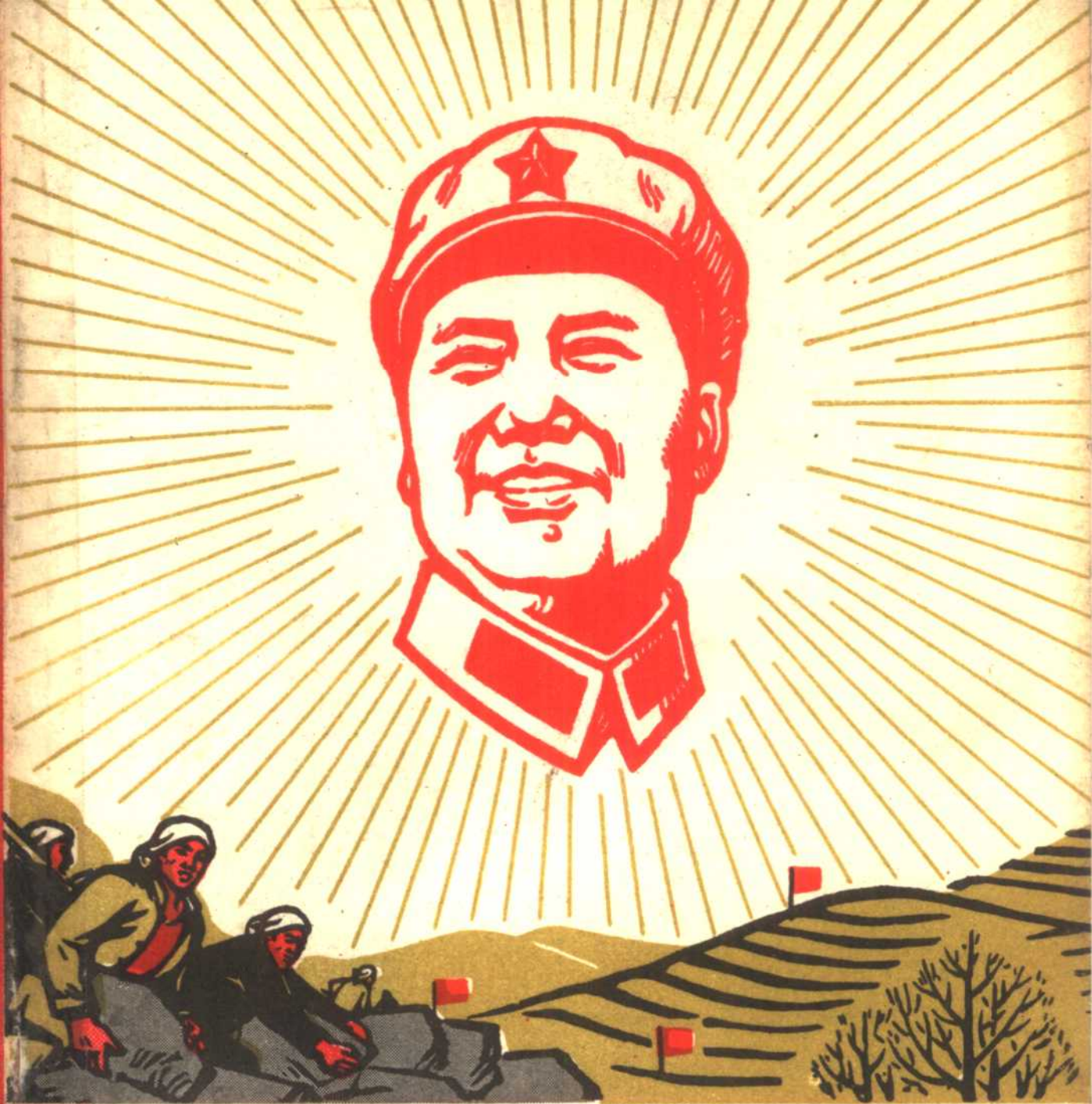




毛泽东思想统帅的 大寨劳动管理

陈永贵

毛泽东思想统帅的大寨劳动管理

陈 永 贵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1968年3月第1版

1968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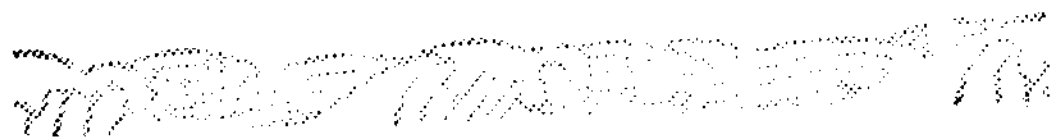
书号3088·253 每册0.08元

(内部发行)



最高指示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
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
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
旧制度的落后性。



前 言

“农业学大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一面社会主义红旗。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寨这面社会主义红旗更加鲜艳夺目。以陈永贵同志为代表的英雄的大寨人，不愧是我国五亿农民学习的榜样。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艰苦奋斗，冲破重重阻力，彻底批判了经济挂帅的烦琐的劳动管理制度，创造了政治挂帅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经验。它为我们

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所必须坚持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也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越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条在经营管理上“斗私，批修”的道路，也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

现将陈永贵同志在一九六七年所作的关于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几次讲话，整理汇编成册，并把大寨大队大队长贾承让同志一篇谈劳动管理的文章，也附在后面，供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参考。

本书在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

山西省农委学大寨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1
谈大寨政治挂帅的劳动管理	1
再谈大寨政治挂帅的劳动管理	32
三谈大寨政治挂帅的劳动管理	53
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劳动管理	69

谈大寨政治挂帅的劳动管理

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在全国一些地区推行了。大寨在山西省昔阳县，但是这个先进经验，过去却不能在山西推行，尤其是不能在晋中地区推行，也不能在昔阳县推行。为什么呢？因为原省委、原地委、原县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反对这个劳动管理经验的。

原省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反对大寨的手段是很恶毒的，鬼花样是很多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树立黑旗，和大寨的红旗对立。他们企图把大寨压垮。几年以前，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在山西挑选了一个大队，实行经济挂帅，并炮制出一个所谓“政治、技术、管理三结合”的管理经验，费尽力气，及时总结，拚命推广，来

和大寨对抗，把大寨的劳动管理说得一塌糊涂。我们认为，那个所谓三结合的管理经验，是搞经济挂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寨的管理经验，是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其实，中国赫鲁晓夫在山西的代理人，早已不打自招，他们说什么：“不管做什么活，没有最高代价，人们是不干的。”看，这副修正主义的嘴脸多么丑恶！他们推行经济挂帅，想用钞票收买人心。他们提倡个人第一，经济挂帅。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钞票，就有了一切。而我们大寨人和全国贫下中农一样，认为只要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他们提倡的是为个人种田，一心为私劳动；我们提倡的是为革命种田，一心为公劳动。这是针锋相对的两条不同的路线，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管理制度。

一九六〇年以前，大寨也实行过烦琐的定额管理。这一套劳动管理制度，我们

认为是不适应农村的，必须彻底批判。因为，农村都是农民，特别象我这号人，在旧社会扛长工，一没有文化，二没有“干才”。我不是八岁上学，而是八岁给地主上工。今天，我们大队的具体农活大约有一百三十多种，烦琐的定额管理制度，要以件计酬，件件包工，这一套劳动管理制度，不仅行不通，而且也记不住。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根本体现不了毛泽东思想，它是经济挂帅的，是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唱对台戏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这个制度正好适应小农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助长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是在这个形势下逼迫我们创造新的办法。

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创造一套新的劳动管理办法。只要毛泽东思想挂帅，什么也能够创造出来！为了创造一套新的劳动管理办法，就必须批判旧的经济挂帅的劳动管理制度。首先是党支部、贫下中农在一起对旧的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大家

一致认为，这个劳动管理制度有问题，并且有严重的问题。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它把旧的习惯势力又加了一层，又升了一级，使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思想更严重啦。人在集体，思想在家，也就是身在集体劳动，考虑的却是个人报酬，私心杂念很多。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有些人不热爱集体，不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他考虑的是“大块地里养精神，小块地里打冲锋”；光强调工分，不强调农活质量；光抢轻活干，不愿干重活。要干重活，首先看报酬多少。如果报酬不多，他就不满意，说什么：“重活就光我做，再没别人啦？”“都是社员，为什么非让我干重活不可？”这样一来，辅助劳力、弱劳力和女劳力也都得干重活，抬大石头也得大家平等。不管男女老幼，都得干几天重活，也干几天轻活和一般活，不然这些人就有意见。他们说：“都是社员嘛，只有这样才公道。”这是什么“公”？这是为公的“公”，还是为私的

“公”？我们说：这不是为公的“公”，而是为私的“公”。

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用参加集体劳动来领导生产。但是在旧的劳动管理制度下，干部能不能参加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队不大，劳动力也不多，但是每天起来包工，耽误的劳动力可不少。支书、大队长、会计每天忙着包工，你包不出来，社员不干，包出来，还得看工分高低，社员才去做。要包工，大寨这个地方坡地多，东坡上来，西坡下去，从早到晚跑上一天，比劳动还累。但是，社员有了意见啦，说什么：“劳动的不挣分，挣分的不劳动。”说干部是甩手掌柜。干部脱离了群众，群众不相信干部，直接影响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用参加集体劳动来领导生产。

担任党支部书记，就得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就得见到人。你见到的是哪几个人呢？就是那四、五个包工的人，见不了广大的群众。见不了群众，就不能把思想工

作做到人的身上。这样，领导生产到不了地，做思想工作见不到人，这样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带来的还不是一个官僚主义！

农业生产是和自然界打交道的，不象在工厂。工厂，它的工作地点是厂房，使用的是机器，出的成品能够看得见，比如规格呀，数量呀，质量呀，等等。农民是和自然界打交道，做的农活大多是在上底下，地面看起来是实的，拨开地面是虚的，这是很难检查验收的。但是，那个烦琐的定额管理里边也有检查验收，说得倒好听，什么群众性的检查验收，实际根本办不到。那个不合理的制度，调动不起人的生产积极性，更不可能让人们热爱集体，因为它是经济挂帅，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所谓群众性验收，弄得不好，就变成了你包庇我，我包庇你；你不要露了我的不好，我也不要纠正你的错误。并不是群众起来管理好集体，提高农活质量，达到保质保量。再说，我们和自然界打交道，今天包下工，明天下了大

雨，天气起了变化，农活、时间、劳力就都得跟着变化，这样一变，包工就感到困难。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们在山上下种，去了六个人，下一亩种是十四分。早上天气很好，上午刮起了大风，下不进种，撒不进粪，连牛也站不稳。本来那里需要做的农活还很多，比如可以刨荒地，也可以整地或垒墙。可是包的是下种，别的工没有包出来，怎么办？只好回家坐起来。反正是实行包工，以件计酬，别的活你没有包，我就不去做。既不能批评，也不能检查。你看这多么机械呀，多么被动呀，怎能合理安排劳力，发挥劳动潜力！这种事情是常遇到的。这样就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也就不能争分夺秒地去进行生产，也就发挥不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在包工时，你看吧，有单干的，有一家人干的，有一伙人干的。思想落后的和思想落后的碰在一起，地富和地富碰在一起。这个包工看来是太自由啦。那些地富坏家

伙碰在一起，是叫他们负责完成农活，还是互相包庇？他们在劳动中嘁嘁喳喳，是讨论干坏事，还是讨论什么？别人很难知道。

完成农活以后，问题又出来啦。这一伙挣的工分高啦，那一伙少啦，这个人一天挣下两三个定额，那个人一天没挣下一个定额。光解决这些问题就够办了，不用说考虑其他工作。比如说我们大寨的饭场，从互助组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几年就成了工分场，一吃饭，就是吵定额，争工分。多挣工分的说，我的干劲大，你没有挣下，是你干劲小，思想不好。实际上并不见得全是这样。这样就闹不团结，社员之间，干群之间，关系就不好啦。这对集体经济有什么好处？这都是烦琐的管理制度造成的，是经济挂帅造成的。如果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绝不会是那样的。那种经济挂帅的管理制度，破坏了团结，助长了自私自利的倾向。集体是干部的事，没有社员的事，这就不是一家人啦。如果是一

家人，为什么办出两家事来？为什么不是人人关心集体，光吵工分？有的社员简直成了“工分迷”，不管集体经济发展不发展，抓到工分就是我的，这样集体经济怎能巩固？因而，闹得一些干部也产生了换班思想，说：“这个干部没法当，还是让别人来试一试吧！不用说大家有意见，就是没意见，我也不干啦。”为什么有意见？有些社员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提意见的。这个自私自利思想，在劳动上光想干轻活，不想干重活，光嫌工分挣的低；要求把自留地种的好些，挖集体的墙脚，给集体经济制造矛盾等等。你要让他热爱集体，他要热爱自己。当然这和思想工作做的好坏有关，但主要是这个经济挂帅的劳动管理制度造成的。比如，我们大寨的赵背峪沟靠的是坡，牛羊把坡上的石头蹬在地里，个别尖滑的人见到啦，这块石头该取不该取？不取吧它占着地，取吧它又没号工分，就只好放在地里。广大贫下中农对这种现

象很不满意。

有时开会也说，要相信群众搞好生产，我们是一家人。说的是相信群众，但做的又不相信群众，说的是一家人，办的又不是一家人的事。既然相信群众，为什么又规定数量、报酬、时间、质量、工分等等，为什么干了又验收，这是相信群众吗？一家人不是一家人，无非是干好挣了分，干不好就批评、扣分、返工。这都是经济挂帅带来的恶果。

一九六〇年，荣退转业军人社员提出来：社员如果能象解放军那样就好办啦，解放军不自私自利，他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干工作没有贵贱高低之分。这话引起了我们党支部的注意：解放军好，我们就学习；解放军也是农村出去的，为什么我们农村非要搞自私自利的管理制度不可？提出问题，通过辩论，就引起了社员群众对这种经济挂帅的劳动管理制度的批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就是

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批判以后，我们就自己动手创造了现在这个新的劳动管理办法。

新的劳动管理办法，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它不要经济挂帅，要政治挂帅，要象解放军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来挂帅。还有人拿解放军作比较，比如跟敌人打仗，拼刺刀，碰上个美国鬼子个儿很大，这时，能不能回来问首长：敌人个儿很大，你给我多少工分？分高了我就刺，低了我就不刺。解放军不是这样，给他的任务越艰巨、越大，他越感到光荣。而我们有的社员却是越让他干点重活，他越有意见。通过对比，找到了原因，思想更亮堂了，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使大寨贫下中农社员一心为公劳动，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才能有力量，才能改天换地，才能战胜一切。

当时我们研究，过去的制度，如三包一